

97
K262.23
3
2

爱国主义教育丛书

省港大罢工

蔡俊桃 编著

目 录

一、南国惊雷	(1)
二、珠江血案	(8)
三、战斗堡垒	(13)
四、工农联合	(18)
五、封锁政策	(21)
六、肃清内奸	(25)
七、审判洋人	(30)
八、火烧东园	(33)

C

367865

九、谈判斗争 (38)

十、光辉篇章 (44)

1949年10月1日
中华人民共和国
中央人民政府
成立

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,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,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,对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一、南国惊雷

1925年5月30日,上海人民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顾正红和逮捕爱国学生,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,遭到了英租界巡捕开枪扫射,当场死伤数十人。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,国内各地人民群众纷纷奋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。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和中国人民反帝革命风暴的到来。

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东。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书记陈延年召开区委会议,研究在广东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。会议决定,派人去香港、沙面,发动工人罢工,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。

去香港发动工人罢工,是个艰巨的任务。派谁去呢?

大家考虑到: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长期从事工人运动,有实践经验。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,邓中夏同香港工会代表团中的各派工会负责人有广泛的接触,他们对邓中夏广博的知识,精辟的言论,敏捷的辩才,政治家的风度,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会议决定,把这个重任交给邓中夏。

邓中夏来到香港,同在香港工作的广东工运领袖杨殷一起,找到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,召开党团员会议,研究发动

工人罢工的问题。

会上，邓中夏介绍了五卅惨案的真相。他说：“几十年来，我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，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为了向英帝国主义表示最强烈的抗议，为了推动革命高潮向前发展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，在香港发动一次大罢工。希望每一个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，都为这次罢工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。如何发动工人罢工，请大家提出意见。

参加会议的人，对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罢工，信心不足。他们说：

“上级的决定，我们拥护。可是，就靠我们这一二十个人，能把香港几十万工人发动起来吗？”

“香港工会很多，大都是旧式的行会组织。拿最大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来说，会长谭华泽，就是个买办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工会，能跟我们走吗？”

邓中夏认为，从主观力量上说，要发动一次大罢工，确实是不容易。但是，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，又要看到有利的一面。他说：“五卅惨案爆发之前，谁能想到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呢？目前，尽管我们有很多困难，但有利条件还是有的。比如，苏兆征领导过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，在工人中很有威望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会跟我们走的。另外，电车、华洋排字、洋务等几个工会，是共产党领导或受共产党影响的。我们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，罢工是可以发动起来的。”

邓中夏继续说：“大家都知道，香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是非常仇恨的。仇恨，是埋在工人心中的炸药。现在，炸药还没

有点着，大家还看不到它的力量。炸药一旦点燃，大家就会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。要把炸药点燃起来，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：一是宣传群众，组织群众，把群众发动起来；二是从上边争取那些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。”

大家对邓中夏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，只是对争取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参加罢工，有人觉得困难较大。

有人站起来问：“这些人，不是把头，就是买办，成天只知道敲诈勒索，喝工人的血。他们能参加罢工吗？”

杨殷说：“这些人，名利熏心。没有名，没有利，他们是不会干的。”

“对。”大家表示赞同。

邓中夏说：“这一点，我们已经估计到了。他们既然要名、要利，我们就抓住这一点做工作，给他们名、给他们利。他们参加罢工，就可以得到爱国的名声，也可以得到罢工经费的实利。如果他们不参加罢工，一旦工人跟着我们走，他们的名、利，也就完了。所以，争取这些人参加罢工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”

邓中夏的分析，合情合理，发人深思。大家表示，一定要克服困难，为发动罢工贡献力量。

香港的工会很多，派系复杂，乱如纷丝。邓中夏纵观全局，从这团乱丝中理出一个“头”。这个“头”，就是工团总会。

说工团总会是个“头”，有两条理由。第一，工团总会所属工会多，有70多个，占全港工会总数一半以上，对罢工有举足轻重之势。第二，香港的工会，很多都被黑社会头目控制。在香港发动罢工，必须取得这些头目的赞助才有可能。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、交际部主任梁子光，都是黑社会中的头面人物。

只要把他们争取过来，就可以影响其他头目。

从哪里下手呢？

邓中夏认为，苏兆征在海员中有很高声望。现在，他虽然不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，但可以影响会长谭华泽，进而影响工团总会。

一天，邓中夏和杨殷专程拜访谭华泽。

谭华泽作为香港工会代表团成员，曾出席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。一见面，谭华泽就说：“那次大会，开得太好了。特别是邓先生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”

寒暄过后，邓中夏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们这次来，有件重要事情，要与谭会长商量。”

谭华泽看到，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来找自己商量事情，十分得意，说：“只要能办到的，兄弟一定效劳。”

邓中夏说：“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，最近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发动大罢工，请谭会长大力赞助。”

谭华泽一听，显得很不自在，说：“兄弟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，一定拥护。只是，罢工爆发后，如果英国干涉，出现上海那样的流血事件，怎么办？”

邓中夏说：“只要大家团结，齐心，英帝国主义就不敢怎么样。”

杨殷趁势捧谭华泽一句：“谭会长热心爱国，这次一定全力支持。”

谭华泽欲退不能，就来了个顺水推舟：“兄弟爱国不敢为人后。既是这样，我和会里同仁商量商量。”

邓中夏、杨殷旗开得胜，接着去找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。

杨殷在香港工作期间，已经和黄金源交上朋友。他和黄金源介绍邓中夏，说明来意。黄金源张口就问：“罢工以后，各工会由谁领导？”

邓中夏就说：“罢工由各工会发动。罢工工人回广州后，仍由各工会自己管理。”

黄金源又问：“上面由谁领导？”

“准备组织一个总的领导机关，吸收各工会领袖参加。”

黄金源以为大权在握，有利可图，立即表示：参加罢工。

工团总会交际部主任、车衣工会会长梁子光，从捞取名利出发，也表示赞助罢工，并答应在车衣工会举行第一次工会联席会议，研究罢工问题。

邓中夏、杨殷、苏兆征、黄平工作顺利，由点到面，逐步铺开。在车衣工会举行的第一次工会联席会议，有电话、清洁、肉菜、电车、海员、机器等工会的负责人参加。会上，邓中夏讲了这次罢工的目的、意义和要求，很多人都表示赞同，唯独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没有表态。

华人机器会，是香港英国当局的御用工会。邓中夏认为，尽管韩文惠反对罢工，但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会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，便派了几个党团员去做工作。

过了几天，邓中夏又在车衣工会召开第二次工会联席会议，成立了罢工的统一指挥机构——全港工团联合会。各大工会的头头、黑社会的头面人物，如黄金源、梁子光、谭华泽、胡荫、陈锦泉、冯敬、谭海山、刘汝泉、毛士珍等，都是这个机构的成员。

当邓中夏等领导人对工会的上层人士做工作的时候，每

一个党团员、宣传员都包一个地方或者若干个工会，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。

木匠工会的郑全，分工向持平工会的工人宣传。工人经常去西营盘巧心茶楼饮茶，郑全也早午必到。

一天，郑全在巧心楼讲五卅惨案的真相。一个工人听了，大骂英帝国主义。正在这里转悠的警察要抓工人。郑全挺身而出，严厉质问警察：“你是不是中国人？”

一向蛮横的警察，在工人义正词严的质问下，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。

经过广泛的宣传、动员，工人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。罢工条件日渐成熟。

邓中夏转回广州，和陈延年研究下一步的工作。

邓中夏说，这次大罢工，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英帝国主义。参加罢工的工人，不是1万、2万，将是几十万。现在，香港各工会的领导人，以及工人群众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罢工工人回广州后，食宿问题能不能解决。这是关系到罢工成败的重大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大笔经费。钱从哪里来呢？

陈延年和邓中夏一起去找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、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。他们说明来意后，廖仲恺立即表示，坚决支持罢工，答应由财政部每月拨款1万元，作为罢工经费。邓中夏随即回香港组织、发动罢工。

6月17日，邓中夏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名义，在西营盘杏花楼茶居，召开工团总会所属各工会的群众大会，由苏兆征主持。

苏兆征说：“工友们！自从五卅惨案发生以来，全国各地都

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。我们香港工人怎么办？为了让社会人士知道我们香港工人阶级热爱祖国，热爱中华民族，不愿做亡国奴，现在，我做个发起人，号召工团总会的工人行动起来，实行罢工，向帝国主义提出抗议。”

苏兆征的提议，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。会上，成立了“工团总会罢工发难委员会”。

第二天，邓中夏以“宴客”为名，在杏花楼茶居举行香港工团代表会议，通过罢工日期、宣言、要求，为罢工做好组织准备。

会上，苏兆征和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、交际部主任梁子光等，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，当场宣布，决定罢工。其他工会的负责人，也宣布参加罢工。但是，也有一些工会的负责人，对罢工缺乏信心，采取观望的态度。

6月19日，电车、华洋排字、洋务3个工会都宣布罢工了，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迟迟不动。

海员工会里，空气紧张到极点。

门外涌满着等待罢工的海员。

屋内，谭华泽坐在桌边，满头是汗，苏兆征在一边催促着下罢工令。

一些工人忍不住冲进大门，举起拳头，对着谭华泽叫：“电车、洋务工会都罢工了，我们为什么还不罢？”

“你到底下不下罢工令？……”

谭华泽见人们一个个怒气冲天，喊声把房子都震动了，吓得哆哆嗦嗦地说：“罢，罢，罢……”

一个海员叫：“罢就下罢工令，几个小时都过去了，你到底

下不下？”

谭华泽脸色煞白，颤抖地说：“马，马上下，马上下……”

罢工的命令终于下了，码头边，海面上，所有的船像得了麻痹症，一下都停下了，横一条，直一条，像死鱼一样浮在水面上……

紧接着，起落货工会、煤炭工会……，陆续宣布罢工。没有下令罢工的工会，是香港华人机器会。因为邓中夏已派人去它所属的工会做工作，会长韩文惠虽然没有下令罢工，工人却自动罢工了。

香港政府慌了，连忙宣布戒严令。英帝国主义者街头、屋顶上架上机枪，连铁甲车也开了出来。到处传说英帝国主义要进行大屠杀。人们纷纷返回广州，一天达好几万。车站边，码头旁，到处睡满了等着走的人。

6月21日，广州沙面的工人也宣布罢工。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，揭开了序幕。

二、珠江血案

1925年6月21日，沙面中国工人宣布罢工后，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发表宣言，指出：“英、日、美、法等帝国主义，不但饮我中国人民之血，而且食我中国人民之肉。不但榨我等之血汗，而且取我等之生命。其压迫我中国人民，始则金钱，继则枪炮。今日我中国人民手足被缚，非自己解放，无人为我等解放。……上海、汉口、青岛市民及工人，一日不胜利，我等一日不返工。为上海案而奋斗，为解除我等自身

痛苦而奋斗！”

沙面罢工委员会决定：在广州市内英、日、美洋行工作的职工，于 24 小时内，一律停止工作；在其他国家洋行工作的职工，继续工作，实行月薪捐款。100 元月薪的，捐款 5 元，作罢工经费。

沙面，在珠江岸边，与广州仅一河之隔，是英、法等国的租界。

沙面工人罢工后，英、日等国开来 8 艘军舰，停泊在沙面附近的白鹅潭海面，给广东国民政府施加压力，他们还派水兵登陆，控制沙面的高楼楼顶和交通要道。

早在 6 月 17 日，广东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举行代表会议，决定成立“广东各界对外协会”，通过援助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办法 17 条。

广东各界对外协会，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。6 月 22 日，各界对外协会召开执委会议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郭素正主持。会议决定，6 月 23 日，在东校场召开广东各界援助沪案示威运动大会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。

各界对外协会还致函省长公署，通告该日一律停业，以便各界群众参加大会的游行；自该日起，广州全市下半旗，市民臂缠黑纱 7 日，以示哀悼。

23 日，罢工回到广州的香港、沙面工人，和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约十万人，手持“援助上海人民反帝斗争”的小旗，陆续开进东校场。

大会分 3 个会场。中间是工人、农民会场，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主持。左边是学生、商界会场，由国民党中央

商民部长伍朝枢主持。左边为军界会场，由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主持。

12点整，大会开始。各界代表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后，谭平山宣布大会结束，示威游行开始。他说，上火线打反革命派的时候，军人是民众的前锋。今日游行，是文明示威，军人当为民众后盾。游行队伍的排列是：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商民、军人。

游行队伍，以工人为前导，浩浩荡荡，从东校场出发，由惠爱路转入永汉路，经西濠口，来到沙基。群众高喊口号，队伍整齐，秩序井然。

沙基与沙面，一河之隔，河上有东桥、西桥两座，把沙基与沙面联系起来。这时两桥交通已经断绝。沙基属广州第九区警察署管辖。九区二分署署长何元钧，率领警员，分别在沙基两面的东、西桥下维持秩序。

3时20分，当工人、农民队伍走过沙基，转入内街，学生队伍来到沙基调元街口的时候，沙面域多利酒店楼顶的英国士兵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。岭南大学教师区励周和学生许耀章当场被打死。跟在岭南大学队伍后面的坤维女中、第二高小的中小學生也遭枪击，许多学生受伤。

英国士兵听到域多利酒店的枪声，立即用机关枪向沙基的游行群众扫射。停泊在白鹅潭海面的英、日军舰，也开炮向沙基射击。

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（即黄埔军校）党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代营长蒋先云率领的第二连、第四连、第七连，一进入沙基，就遭到沙面方面的机关枪扫射。

沙基是一条开阔的马路，队伍没有地方隐蔽。蒋先云命令全体官兵，以行人道的柱子作掩护，监视沙面的动向。

第四连代理连长宋希濂向蒋先云报告，他的队伍走到东桥斜对面的沙基街头时，遭到东桥上的英国士兵射击。各连官兵，满腔义愤，一致要求蒋先云下令还击。

蒋先云，本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，曾参与领导著名的安源大罢工。还领导过湖南水口山矿工工人大罢工。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，现已成长为军事指挥员。

这时，蒋先云考虑到，眼前发生的惨案，是国家大事，不是几个连的兵力所能解决的。况且，英国士兵都有洋房、沙包作掩护，靠步枪火力是不能杀伤他们的。蒋先云当机立断，大声下令：“不准开炮！”

英国士兵仍在射击。黄埔军校党军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曹石泉，第二排排长义明道、陈纲，被机关枪射中，当场牺牲。传令兵许国良受了重伤。蒋先云脚也被弹片擦伤。他说：“革命军的职责是救国救民，我们要继续掩护群众走避。”

下午4时，大雨倾盆，沙面方面才停止了射击。

据救护队统计，在沙基惨案中，有54人被打死，117人受重伤，轻伤的不计其数。

英帝国主义者制造了沙基惨案，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。英国领事杰弥逊照会广东国民政府，声称这次事件，是黄埔军校学生军“首先开枪，至百响之多”，沙面方面才“不得不还击”。

蒋先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写了《6月23日沙基惨案报告》，予以驳斥。

蒋先云说：“我是23日沙基惨案最后离开帝国主义者虎

口的一个，同时亦是被机关枪射击幸而不死的一个。惨案的经过，身受目睹。今陈述其经过的实在情形，以证明帝国主义的阴谋。”

接着，蒋先云说：“我们正行到沙基街，前面即有枪声，沙面之帝国主义者已开枪射击前面之学生。于是，在军队前面之学生及工农，皆仓惶逃避。我等对面的机关枪及步枪，皆向我射击。始则枪声霹雳，继复枪声隆隆，知外舰亦已向我开始射击。”

最后，蒋先云说：“英帝国主义者反唇相加，谓系我黄埔学生军开枪在先。然我学生军决非至愚。若真要杀帝国主义者，岂肯使我手无寸铁之工农商学同胞先行，送与帝国主义者屠杀？且当日军队，皆用四路纵队而行。若真要杀帝国主义者，当先知帝国主义者亦必杀我，又岂肯用密集队形前进，至受莫大损伤！……帝国主义者嗜杀弱小民族而不负责，甚至反唇相加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除已报告所属长官外，谨此报告，希转呈政府以为交涉之一份佐证。”

在沙基维持秩序的第九区警察署二分署署长何元钧，也以自己目睹的实情，向上级写了报告。

何元钧说：“2时15分，巡行大队到来，都严守秩序，沙面内有外国人全副武装站立观望。巡行者虽高呼口号，但并没有任何过激行为，所以安然无事。在3时20分，巡行大队前队已过去八九成。工人、学生将随后转入内街时，沙面外国人忽然躲避起来，学生正到沙基调元街口附近之际，沙面域多利酒店楼上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竟开枪向巡行群众射击。而英国工部局一听到枪声，就用机关枪向沙基一带射击。不一会儿，沙面射

击的枪声如连珠炮。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，也开枪向北岸射击。我巡行各队，均纷纷走避，并无还枪射击，而他们竟开枪一小时之久，也没有停止，以至于我方民众死伤众多。……为些市民大巡行，也只求伸张公理，并无越轨行动。而沙面内凶徒，竟无故开枪射杀我国多人，实在是横暴已极。”

7月11日，广东各界人士举行沙基惨案烈士公祭大会。参加的有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100多个团体，约10万人。大会庄严、隆重。主祭人献上红花数朵，放在54位死难烈士灵前，并宣读祭文，表示要继承烈士的遗志，同帝国主义战斗到底。

三、战斗堡垒

沙基惨案，是英帝国主义对省港大罢工的武力镇压。但是，洋枪洋炮没有吓倒省港工人，反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。到1925年6月底，香港的罢工工人就达25万。

省港罢工初期，面临着一个形势复杂、斗争险恶的局面：既要和英帝国主义以及各种反动势力对于省港罢工的破坏作斗争；又要妥善解决罢工队伍内部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，统一反帝斗争的认识的步伐，保证有效地进行反帝罢工斗争，因此当时的首要大事，就是必须迅速建立一个坚强和健全的组织。

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，邓中夏、苏兆征、林伟民和李森等人积极投入了建立罢工领导机构、健全罢工组织的工作中。他们根据运动领导罢工斗争的实践经验，决定建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作为团结广大罢工

工人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指挥部。

但是，建立一个坚强健全的罢工领导机构，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，其中贯串着一系列的复杂斗争。当时，香港工团总工会会长黄金源、交际部长梁子光等，在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，千方百计地想把罢工领导权抢到自己手中来，以使罢工中途夭折。他们先是反对组织罢工委员会作为统一的指挥部，主张香港、沙面各设一套机构，各行其事。他们极力反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于罢工的领导，实际上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力图把这场罢工置于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的控制之下。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问题上，他们又反对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正确主张，提出要以工会为单位，无论工会大小都一律选举同等数目的代表，这样，他们就可以占据多数名额，从而操纵工人代表大会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邓中夏、苏兆征等对他们进行耐心说服教育，告诫他们不要闹分裂，应以反帝斗争大局为重。在问题处理上，邓中夏等对于一些原则性问题就毫不让步，但对一些非原则问题则适当迁就。例如在坚持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罢工委员会同时，可以保留一些黄色工会头目当负责人的香港工团联合会等组织，让他们在不违反罢工斗争利益的情况下继续活动，从而分化瓦解反对势力，团结了广大罢工工人，同心同德地进行反帝斗争。

经过一再宣传教育，终于通过了由香港罢工工人方面选出苏兆征、何耀全等7名代表，沙面罢工工人方面选出曾子严、黎福畴等4人为代表，再加上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林伟民、李森两人，一共13人，组成了罢工委员会。

7月3日,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。在林伟民主持下,罢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进行选举,大家一致推选苏兆征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,何耀全、曾子严为副委员长,聘请廖仲恺、汪精卫、邓中夏、黄平等为顾问。

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:干事局,处理罢工委员会日常事务;财政委员会,筹措及管理罢工经费;纠察委员会,指挥工人纠察队;保管拍卖处,保管拍卖工人纠察队截获的仇货;审计局审核各部门的开支帐目;会审处,处理破坏罢工的案件;拘留所,关押破坏罢工的犯人;劳动学院,培训香港、广东的工会干部;工人医院,给罢工工人治病。省港罢工委员会还出版自己的机关报《工人之路》。

黄金源不得人心,没有被选入省港罢工委员会。邓中夏把他安排在纠察委员会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。

干事局局长一职,事务繁重,责任重大,管理一二十万人的衣食住,经手很多钱财物。梁子光认为,这是个大有油水的差事,眼睛直盯着它。

一天,梁子光气呼呼地对邓中夏说:“现在外边议论可多啦!大伙都说李森怎么能当干事局局长呢?应该由发动罢工的人担任嘛!大伙还说,这次罢工,功劳最大的是香港的工会,人也多,可是回到广州,根本瞧不起我们,这叫什么事?”

邓中夏看透了他的来意,便笑着说:“这次,很多工会领袖,连你在内,都还没有很好安排工作,罢工委员会正准备好好研究一下。”

事后,邓中夏对李森说:“这只是梁子光少数人在那里兴风作浪,群众是不会投他们的票的。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